

## 從視角觀點解讀《五個女子和一份報紙》中 社會文化符號的傳遞意義

江曉昀

### 摘要

《五個女子和一份報紙》的討論對象正是在 921 地震之後，親身踏入中寮鄉災區，為社區報導的一個團體——「果然工作室」，作者須文蔚透過「果然工作室」五個女子的視角，敘述出中寮地區的受災狀況，以《中寮鄉親報》反映事件真相與事實，將 1999 年 921 大地震期間中寮地區的狀況呈現出來，顛覆傳統新聞必定要求的客觀性，把主觀想法寫到新聞裡，以伍爾夫（Tom Wolfe）指出的四個功夫「場景結構、對話實錄、第三者觀點、人物瑣事的仔細點描」為寫書策略，全文不見「我」字，用各種場景換幕方式展開敘述的結構頗具感染力，不同於人物專訪的方式。一群社區工作者旗幟鮮明地走進社區，又同時辦報紙，勢必難以兼顧各種地方勢力的意見，不同於一般平衡報導的方式，《中寮鄉親報》在複雜的政經環境下，在當地行政機關的疏失與重建團體間的扞格之間，她們就其所視，把鄉民悲苦的處境點出，尋求外界支援。在文本中我們所看到的不只是地震帶來的自然損害，更看到了社會現實冷暖的交伴與政治角力的鬥爭；也許有人會說文字就只是文字，但文字的力量就在於鮮明地呈現報導對象，敘事出別人錯過的曾經，或許千百年後留下的，就也只是這些曾經，本文試圖從《五個女子和一份報紙》中探討臺灣社會現象所反映出的文學傳承意義與報導文學創作的時代價值。

關鍵詞：新聞、敘事、再現、記憶、文化符號

## 壹、前言

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隨著時間推移，真實事件變成新聞故事，年代久遠後甚至轉變而成傳說或社會文化中的神話，將「神話」與新聞相提並論之討論，如羅蘭巴特(R. Barthes)之著作《Mythologies》該書<sup>197</sup>強調符號(codes；如語言或新聞)具有意義及顯著性，代表了人們的興趣、價值、與行為。透過新聞敘事確認自己和社會之間具有某種心理或文化聯繫。由文化的角度觀之，新聞敘事的功能可能就在滿足大眾某種心理需求，對於同一件新聞事件，可能有不同的解讀方式，甚至穿鑿附會引來許多神鬼之說，如美國 911 恐怖事件後，許多人討論著雙子星大樓前拍到的照片中出現了惡魔的臉孔，加上了想像後令人不寒而慄，也就此迎合了部份讀者的好奇閱讀。

九二一地震後災區湧入大量民間志願性工作團隊，在短時間內引發了台灣民間力量的高度動員。關切台灣「民間社會」發展議題的人總會對地震成立的各式各樣的「工作隊」抱持著高頻度的掃描，「民間」在政黨輪替的夾縫中會變成什麼樣子，一直是令知識界及社運部門所好奇的。敢於投入災區工作的工作者，無論就現在或當時的觀點來看，都不會是一般的人物。他們每個的主體性較一般人為強，也有一套非常執著的看法與世界觀；加上，若沒有足夠的行動力也不可能在短期內貿然投入災區、並在災區待下來。這些後來泛稱為「工作站」的民間團體在地震三年後到底變成什麼樣子？九二一震災之後，台灣社會快速動員，災區自外湧入大量金錢、物資、及志願性工作人員。一時之間，「災區」呈現的是完整而生命充沛的「民間社會」景象，而地方政府在救災相關公眾事務上，又扮演著何種功能和角色？因此，看待災區民間工作團隊的發展和演變，如果忽略了微觀的、對個別工作者「人」的解讀，會讓「災區」的意義高度扁平化，難以看到報導的實質意義。

透過敘事形式再現社會事件，也同時建構社會真實。如果在從事新聞寫作的過程中，對敘事理論所關注的論述、語意與修辭、故事結構，以及故事中之衝突與危機、發現與背景等加以注意，無異使新聞不再只是單純事件的報導，而是透過敘事歷程從事傳遞社會文化符號的過程。總之，新聞敘事的重點在以「論述」和「故事」兩方面討論新聞要素的結構形式。在論述部分，新聞著重如何再現或如何傳播、表達社會真實，而故事本身就敘述者或另有隱含作者從什麼角度來觀察而有不同的結構和情趣<sup>198</sup>，本文試圖透過新新聞的主體意識與敘事學的視角觀點，解讀 921 地震當時中寮地區場景與《五個女子和一份報紙》所形成的社會文化符號意義。

<sup>197</sup> 羅蘭巴特(R. Barthes)：《神話學》(Mythologies)，台北市，桂冠，1997，頁 189-190。

<sup>198</sup> 胡亞敏：《敘事學》，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頁 19。

## 貳、報導方式的理論與應用

### 一、新新聞、Gonzo 新聞的思想背景

美國新聞界在戰後曾數度出現改革呼聲，如赫欽斯委員會（The Hutchins Commission）發表的「自由與負責任的新聞（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報告，後來陸續又有「新新聞（The New Journalism）」風潮，和全國新聞評議會（The National News Council）的成立，公共新聞可算是第四個、也是最近一次的改革行動。赫欽斯報告和全國新評會都是由新聞界以外的社會力量發起，希望藉外在的監督促進新聞媒體良性發展；新新聞則是由新聞工作者自發，但並沒有形成集體行動；至於公共新聞，不但是由新聞界的自省出發，且在很短時間內即匯聚了各界力量，成為有組織的一股運動。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教授詹姆斯·卡瑞（James W. Carey）即指出，公共新聞是美國戰後第一個採取社會運動形式，有組織的新聞改革行動。新新聞不同於傳統新聞學，Gonzo<sup>199</sup>（剛左）新聞學充滿奇想與個人情緒，畢竟是地下文化的，為之鼓掌的人再多，新聞學教授也不太敢公然教授，也無法教授，但這種寫作方式卻影響了後來的另類新聞與搖滾報導的寫作風格。

### 二、理論的應用與驗證

《五個女子和一份報紙》的作者須文蔚採用「新新聞」（New journalism）的報導方式，挖掘並了解社會問題，呈現事件的影響與意義，採取異於客觀性報導的主觀主義區隔傳統新聞寫作，使其更具實踐、參與和批判性。由傳播或文學領域綜合觀之，文學作品必須是在最大的可能範圍內作研究，而非作單獨的研究。每一件文學作品都是和社會及文化因素交互影響的結果，作品本身就是複雜的文化物體<sup>200</sup>。或許真相隱藏在新聞事件的背後，只是在報導事件的同時是否能夠呈現出來，如果新聞報導只是條列說明事件的發生而沒有將事件的前因後果作一個有機的串聯，那麼報導也只是雜記，並不能帶給讀者省思，即便報導中的主體意識不同於讀者，但這也正激盪出真相的浮現。所以，報導手法是會誤導讀者，還是能夠引發共鳴，評論對錯或許不是重點而議論的過程卻是思維觸角的延伸。

---

199剛左（GONZO）的由來

杭特·湯普森（Hunter S. Thompson）原來是體育新聞記者，後來成為《滾石》雜誌的特約作家。他在六〇年代與一掛「新新聞」（New Journalism）記者企圖顛覆傳統的新聞寫作方式，反對新聞有任何客觀性的可能，而盡可能把自己看到和感覺到的主觀意見寫入新聞裏。他們相信，寫的像小說的新聞報導才能更接近真相。湯普森稱他自己的寫作方式是「Gonzo Journalism」，意即荒誕新聞。「Gonzo」這個字因為他而被收入牛津字典裏。Gonzo 是新聞沒有任何規則，但就是因為沒有規則，要寫出好的 gonzo 式新聞並不容易。湯普森說，一個好的 gonzo 記者「需要精熟的新聞工作者的才能、藝術家/攝影家的眼光和演員的放肆」。

<sup>200</sup> 格瑞柏斯坦（Sheldon Norman Grebstein）著，李宗譯：《現代文學批評面面觀》，台北市，正中，1996，頁 189-190。

新聞報導可說是新聞工作者個人以及新聞組織對這些事實的「轉換」或「再現」，經由符號或語言加以描繪。新聞內容所涵蓋者雖然仍是事實，但是這些事實經由轉換或再現後，卻已是「加工」後的產品。在新聞報導中，記者是主要講述者，以「全知觀點」報導事實，彷彿對事件發生過程與細節均有所瞭解，甚至能看透某些參與者的心理狀態。

新聞報導內容與人類行為有關，新聞所再現者就是人類社會的互動情境，也是閱聽眾所感興趣而過去未聞之故事。新聞與故事同樣具有類型結構，如一般新聞有「導言」與「軀幹」之分。再者，新聞如同一般敘事經常採用不同角度講述故事，文本以「第三者」觀點的陳述並用不同場景換幕方式展開，敘述者的著眼點及其所反應出的社會意義是本文所要探討的方向。

### 三、新聞敘事理論的應用

敘事學作為法國結構主義文學理論的一個分支，誕生於 20 世紀 60 年代。1969 年托多羅夫（Todorov）首次提出「敘事學」這一概念<sup>201</sup>。敘事學主要研究的是虛構的文本如神話、民間故事、小說等。故事是敘述的內容，即一個或多個事件，敘述指話語或敘事文本，敘述行為指作者的敘述動作。如果我們把這三個層次和新聞作品相比較，可以發現「新聞」與「敘事」的關聯，新聞作品中也存在這三個層次，從敘事學的角度，嘗試以敘事「視角」的概念引入新聞作品的文本分析之中，敘事作品講述故事，即時間序列中的一系列事件，而新聞正是講述時間序列事件的文本。唯一的區別是，新聞作品必須敘述真實的事件。如果我們把握好新聞的真實性原則，或許可以把敘事學應用到新聞作品的研究之中。

在卡勒的敘述理論中提及同一個故事如果用不同的視角講述，所呈現出的情節與帶給讀者的感受亦各有不同<sup>202</sup>。敘事學的視角處理問題中，通常把視角的基本類型分為：零聚焦、內聚焦和外聚焦<sup>203</sup>。零聚焦指作者採取一種上帝似的視角，對事件做出全知全能式的敘述。內聚焦指採取故事中某個人物的角度敘事，並且能充分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外聚焦指從旁觀者的角度敘事，可以審視外部事件卻不會進入任何一個人物的內心。文本中對事件的敘述方式是穿梭於各處地點、各個時間，從整體上勾勒出事件的千頭萬緒，反映事件全貌，帶來充分的資訊甚至加入自己的主觀看法主觀情緒，從而把自己的話不動聲色地表達出來，《五個女子和一份報紙》看來合乎「新新聞的主體意識理論」與敘事學中零聚焦的視角類型，解讀是一種發現意義的過程，以下試就文本的敘事方式解讀其所表達出來的社會文化符號的傳遞意義。

<sup>201</sup> 羅伯特·休斯著，劉豫譯：《文學結構主義. Structuralism in literature : an introduction.》，台北市，桂冠，1992，頁 30-31

<sup>202</sup> 卡勒（Jonathan Culler）著，李平譯：《文學理論》，1998，頁 91。

<sup>203</sup> 胡亞敏：《敘事學》，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頁 23-34。

### 參、《五個女子和一份報紙》視角著眼的社會文化符號

文本中所述及之採訪者王亞力等五人具有社會運動的思想背景，其中馮小非接受阿圖塞<sup>204</sup> (Althusser) 意識型態理論<sup>205</sup>，認為改變意識型態十分困難，不如先承認現狀的混亂與不公平是既定條件，從觀察到結構中惡的存在，用特有的「動態搏擊」即主動發展問題的方法，用筆、攝影機和不斷的報導貼近中寮人的生活，試圖幫他們說心聲、找希望。

作者首先以王亞力的眼睛為鏡頭，透過她的所見作災區現場的情境描寫：

鄉民在中寮國小搭建帳棚，教學的教室變成了扭曲的假山，無名火居然還在其中悶燒著，國軍派駐的救援部隊已經有挖土機蠕動在廢墟上開挖，大量的灰與沙穿過細雨飄來，空氣中夾雜著更遠處散出消毒藥水包裹著的屍臭，一起撲向整個操場上的老老小小。<sup>206</sup>

「扭曲的假山」、「悶燒著的火」、「蠕動的挖土機」、「穿過細雨飄來的灰與沙」、「屍臭」、「操場上的老老小小」這些富有情緒性字眼的「符徵」，經過結構出來的畫面，是一種蒼茫灰暗了無生意的世界，作者筆下的中寮鄉是如此的絕望和無助，即使有挖土機作最後的一點努力，卻只是蠕動，沒有發現的喜悅。「無助」的背後，有沒有堅持下去的力量，當沒有任何人能給予幫助的時候，自己必須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中寮鄉民的力量在哪裡？當政府救援的效力未及，各界的關懷又尚未來到，記者在文本中所呈現的畫面裡傳遞的「符指」，除了可以看到人世間不可抗力的危難與無奈之外，我們還能作什麼？拿著一支筆的新聞工作者又能帶來什麼支持力量？文字，能否喚起讀者的共鳴與思想而不只是靜默在紙上呢？

五個女子象徵著對這片土地關懷的動力，其中馮小非提出辦報的理想，希望透過報導更能喚醒執政者的使命感與鄉民本身的希望，從作者對馮小非堅持理想的描述中，我們看到了一股「明知不可為而為」的傻勁，一份報紙，以先見之明察覺了土石流迫切的危機卻無力回天：

<sup>204</sup>阿圖塞認為，意識型態是個體與真實存在狀況之間想像關係的再現。在阿圖塞的架構下，媒體藉意識型態運作，是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此一概念與古典的壓迫性國家機器相對立。因此媒體的效果，不在強加的假意識 (false consciousness) 層面，也不在態度變遷層面，而是在再現與經驗的潛意識範疇中。

<sup>205</sup>從文學、哲學、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歷史」(History)是視為一個線性的、單一的、普遍性的、絕對的、毫無瑕疵的歷史(seamless history)。「典律」的存在則被視為是天經地義，具有無上的權威及崇高的價值。任何人皆無法更動「典律」之組成分子，因為它具有高度的選擇性(selectivity)，是由最好的文學家，哲學家，政治家、歷史學家等最具代表的言論精選而成。其流傳下來的作品則肩負某種歷史的重任，簡單的說，傳統的典律概念，提供某種權威的準則並讓這種準則得以教育、塑造人的主體性。這種準則就是阿圖塞(Althusser)所謂的意識型態。阿圖塞認為意識型態在促成「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的過程是扮演著極重要的過程，因為一切的意識形態皆通過主體範疇的作用，把具體的個人喚成或建構成具體的主體。

<sup>206</sup>向陽、須文蔚(2003):《報導文學讀本·五個女子和一份報紙》。台北:二魚,頁456。

《中寮鄉親報》在地方的人緣與日俱增，但是災民安頓的狀況卻未見改善，特別是中寮山區土石流的問題，任憑這五個女子聲嘶力竭，高呼危機重重，也只能眼睜睜看著山繼續行走，民宅接連壓垮，甚至傳出人命。

《中寮鄉親報》在 921 這個情境裡是一個事件也是一個符號，它代表的是五個女子為這片土地努力的執著，相對於社會文化中存在的媒體，每每拋出的議題是各個符號的串聯，傳達出社會文化的意義。視角的本身與取材的方向決定了報導的目的及意義，以新新聞主體意識為原則，著眼於中寮鄉民的苦痛，透過五個女子之所見，以實用取向報導鄉民的需求，引人共鳴。

社會新聞中相同的情境反覆出現，不管是颱風、地震或工程弊案，行政程序的延宕與官僚政體的黑暗面，似乎不會因為報導而杜絕：

既然報導難以扭轉現況，那報導的意義何在？報導申張公理正義，真實呈現當時的狀況，所以報導本身的自主，不被黨政組織所利用是必要條件，如《中寮鄉親報》扭轉了輕視的眼光進而受到重視正是作者須文蔚在文本中肯定的價值所在：

《中寮鄉親報》不斷為民眾「翻譯」重建法規，在中寮觀察社區發展的林逢展就表示，這五個女子念茲在茲的就是提醒地方民眾爭取權益，雖然有很多人不管透過任何社會運動都喚不醒，但是能改變現狀，她們都不會放鬆。越實際貼近問題，越會發現許多問題盤根錯節，難以一時之間加以改變，陳卉怡表示：「當問題解決不了的時候，那就記錄下來然後嘲笑它！」出於社會實踐的理念，發揮了社區整合和運動的力量而備受矚目並獲得在地居民的尊敬。馮小非開始受到鄉公所的認同，鄉長還延攬她進入「中寮鄉重建推動委員會」。<sup>207</sup>

《中寮鄉親報》只是眾多報導媒體中的一個，也有其他報導將視角取向政府政策方面，說明政府救災組織與具體作法，如：

921 震災發生之後，當時的行政院院長蕭萬長先生委請遠哲邀請一些民間專家學者與社會人士組織「災後重建民間諮詢團」，這是一個為期甚短提供建言的純民間義務組織，對當時千頭萬緒的重建工作如何安排，以民間的立場提供意見<sup>208</sup>。

五個女子以反映災民心聲及需求為立足點，說明外來團體進入災區，報導當地人民生活的歷程，若沒有相對的同理心，誠心地關懷災民，就無法觸碰到問題的真实面，另外受訪者接受與否的問題，加上社會普遍對重建成效感到不耐時採訪的環境十分艱鉅，須文蔚寫出五個女子對目標的堅持，不斷地詳實報導當地狀況與居民的相關權益，形成一股共鳴力量，告訴當地人民仍有許多人為這片土地付出心力，帶給他們曙光與方向，此正是報導本身的價值所在。

<sup>207</sup>向陽、須文蔚（2003）：《報導文學讀本：五個女子和一份報紙》。台北：二魚，頁4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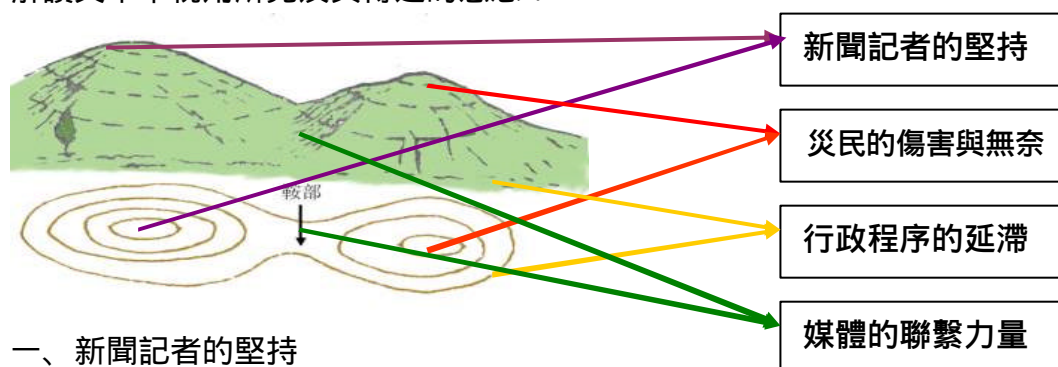
<sup>208</sup>敬答「國師變轎夫」李遠哲（聯合報92年7月25日社論）92.08.01

## 肆、《五個女子和一份報紙》的社會文化傳遞意義

「新新聞」(New journalism)的報導方式，挖掘並了解社會問題，呈現事件的影響與意義，採取異於客觀性報導的主觀主義(subjectivity)區隔傳統新聞寫作，使其更具實踐、參與和批判性。

本篇文章到底是在報導921地震後的災後的情形，還是在讚揚這五個女子的報導使命感？即其題旨究竟為何？答案相信是後者！因為：以五個女子到災區辦報為題材，若採取一般新聞的報導方式寫出，不過就只是人物專訪，只能達到告知的功能，啟示作用或感染功能相對欠缺，所以在閱讀過程中一直可以感覺到這五個女子的堅持與勇敢，故而作者的寫作手法與策略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點。

當災民的傷害與無奈已累積到最高，卻由於行政程序的延滯而難有解決，藉由新聞記者的堅持與讀者本身以各個面向的報導拼湊出事件的樣貌，才能夠俯瞰透視問題之所在並尋求解決的辦法，於此足見媒體的聯繫力量，試以圖像解讀文本中視角所見及其傳遞的意念：



### 一、新聞記者的堅持

馮小非，第一次在災後用攝影機對準人，她深深吸了一口氣，全身用力抵擋莫名的情緒，按下快門的同時，她想著：「我一定會報導出來，一定為你們做一些事情。」<sup>209</sup>

在新聞記者的心中，需要一份熱忱和使命感，為了呈現更多的事件與問題，再多的困難與挑戰也要堅持下去，災區的狀況需要記者涉身現場採訪記錄得讓外界了解，在衛生、交通、民生用品各方面都匱乏的情況之下，如果沒有理念的堅持，事件的經過便就此被遺忘，那麼災民的困境又有誰能幫助？災民家園的復健工作或許就會遙遙無期。

這五個女子念茲在茲的就是提醒地方民眾爭取權益，雖然有很多人不管透過任何社會運動都喚不醒，但是能改變現狀，她們都不會放鬆。<sup>210</sup>

須文蔚在文本中透露出五個女子的堅強與堅持，就社會大眾的立場看來，她們帶來災區的事件與問題，站在記者的立場來看，不也鼓舞了新聞工作的士氣與熱忱，記者並不孤單，因為仍有許多堅持理想的夥伴用文字或影像構築了對這片土地的愛與不捨。

<sup>209</sup>向陽、須文蔚(2003):《報導文學讀本·五個女子和一份報紙》。台北:二魚,頁459。

<sup>210</sup>向陽、須文蔚(2003):《報導文學讀本·五個女子和一份報紙》。台北:二魚,頁468。

## 二、災民的傷害與無奈

全鄉 17928 居民中共有 179 人死亡，幾乎每一百位住民就有一位死亡，是本次震災中罹難比例最高的一個鄉鎮。根據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的統計資料顯示，全鄉總戶數 4780 戶，全倒、半倒房屋合計 3966，佔總戶數的 83%，也是屋倒比例最高的一個鄉。<sup>211</sup>

大地震過去一年，但是死亡還在持續中<sup>212</sup>。當大部分的災區都在復建中，許多相對繁華的都會區，已經不太容易感受到地震的創傷，但是在中寮鄉，地震的傷痕還是明白的烙在永平街上，這條過去中寮最繁榮的街道，如今卻是一片死寂，街上被震跨的鄉公所還沒有拆除，中寮人每路過這裡一次，地震的回憶就被喚起一次。當地到處都是土石流，產業道路一年都不通，奄奄一息的農作物包括香蕉、龍眼、竹筍，運不下山來賣，連檳榔都沒有人吃，農業也完了。至於做零工，機會少，競爭的人又多，生計幾乎完全沒個著落，在強大壓力之下，一些負擔家計的中年人，無路可走，只好選擇自殺。當時的中寮，只能用「淒涼」、「等死」、「人間地獄」來形容。

## 三、行政程序的延滯

工程款撥不下來，只能眼睜睜看著家當一步步遭到土石流摧毀，受著凌遲般的痛苦。<sup>213</sup>

政府行政效率低落，地方黑金派系，橫行無忌，重建之路，崎嶇不平。反觀，來自各地的企業集團、宗教團體及社區文化團體等「非政府組織」，卻展現驚人的活力與行政效率，適時補強政府效率的不足。台灣行政體系究竟出什麼問題？學校重建工程下放地方政府，起跑已經慢了大半拍，隨後徵求建築師、營造廠招標，樣樣得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怎麼趕都無法跟得上民間認養單位。921 大地震重創了台灣十分之一鄉鎮，但危機就是轉機，政府若能利用重建，擺脫黑金，積極結合企業、社區與社團的力量，讓台灣地方機制，脫胎換骨，將是台灣全民之福。

## 四、媒體的聯繫力量

像和興村的呂春寶一家人，始終相信屋後危殆的山坡只要做好排水工程，就可以躲過一劫，因此從過年前開始，他們四處陳情，終於在六月初獲得水利處官員的首肯，願意撥款支應這個小計畫。馮小非和小牛都覺得這個案例應當廣為披露，一方面可做為其他民眾爭取權利的參考；二方面，透過媒體報導也可督促政府兌現政策支票。<sup>214</sup>

報導作為傳播與承傳文化的媒介，以社會文化制度代言人的角色與身份存在於時代的記憶中，如果沒有實質溝通與揭露問題的功能，或自主質疑的論點那麼呈現出來的現象也只是一言堂的陳述而已，所以具備思辨能力的「視角」才能讓報導產生自主性、自為性的社會功能與文化意義。

<sup>211</sup>向陽、須文蔚（2003）：《報導文學讀本·五個女子和一份報紙》。台北：二魚，頁 460。

<sup>212</sup>依據 890910 的中時晚報

<sup>213</sup>向陽、須文蔚（2003）：《報導文學讀本·五個女子和一份報紙》。台北：二魚，頁 467。

<sup>214</sup>向陽、須文蔚（2003）：《報導文學讀本·五個女子和一份報紙》。台北：二魚，頁 466。



## 伍、結語

文學的傳承與報導文學的創作，透過不同的符號體系顯現出它的時代意義與價值。由於符號往往是一字多解、一詞多義，傳媒報導的如實反映，有其一定的困難，不負責任的媒體可能乘機製造出一個假象的世界，所以傳媒不能依附於當政者，成為當政者的工具。

在《五個女子和一份報紙》中，作者須文蔚的視角是通過實際參與救災採訪工作的五個女子所見所感來記述中寮地區在 921 地震後的情形。如果作者的目的是要批判當政者救災動員的緩慢或是災民迫切需要幫助的期望，不需要大費周章透過別人的眼睛和感受來說明災區的情況，所以作者的運鏡手法跳脫了個人自我卻又充滿了角色人物的主體意識，不但頗具說服力而且引人共鳴。文本中描述的字眼是一種象徵或是稱之為符號，難道鏡頭一旦帶到災區，除了災民的愁苦與無助之外，就只能看到殘破不堪的家園、歸屬不清的責任或官僚鬥爭的嘴臉嗎？政府積極主動的關懷何在？文本中五個女子的採訪精神，相對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作者除了傳達 921 災後的狀況之外，更讓我們省思採訪本身的社會意義。

現實生活中，每一個人看到的真實世界的都不一樣，更何況透過了媒體「轉述」的世界。弔詭的是，事實只有一個，但是媒體的立場、記者的價值觀、或展示「證據」的方式，甚至是「新聞公平」的信念，往往都呈現出不同的「事實」，有時候自己也搞不清楚人類是活在真實世界中，還是甘之如飴地活在「虛擬」的世界中。媒體生態還未做出結構性改變前，廣告購買、媒體政治立場，乃至於偶有所聞的金錢供養或感情糾葛，報導的視角帶給大眾所見的「媒體事實」與真正的「事實」之間存在不小的差距。

媒體觀察的「終極關懷」究竟是什麼？是要從公民、消費者的角度出發，以現行組織、媒體形式進行永無止境的媒體批判？還是要徹底翻轉媒體結構、形式，成立嶄新、獨立的新媒體來進行新聞報導？儘管這些問題似乎尚未得到有效釐清，但由於台灣媒體高度商業競爭的惡質發展，已愈來愈侵犯到各階層民眾的隱私權、人格權與司法人權，因此媒體觀察在台灣也愈來愈具有迫切性與必要性。

中寮不是第一個災區，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在每一次事件發生時，需要報導者點點滴滴的關懷與時時刻刻對政府的監督，才能發揮最大的報導效益，在《五個女子和一份報紙》中讓我們看到了「果然工作室」一本媒體工作者的使命，相信報導除了呈現事件之外，更能帶給社會省思與溫暖。

## 參考書目

1. 方 珊：《形式主義文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2001 重印）
2. 尤瑟夫·庫爾泰著，懷宇譯：《敘述與話語符號學》，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3. 卡勒（Culler）著，李平譯：《文學理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4. 向 陽、須文蔚：《報導文學讀本·五個女子和一份報紙》，台北市，二魚，2003。
5. 克勞德·李維斯陀（Claude Levi-Strauss）著，楊德睿譯：《神話與意義》，台北市，麥田出版社，2001
6. 冷尚書撰稿，《台灣社區重建協會（籌）基本資料》〈阿扁總統：災民不能再等了一災區工作者對新政府的期待與呼籲〉，頁：19，2001。
7. 胡亞敏：《敘事學》，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8. 夏丐尊：《文藝論與文藝批評》，台北市，莊嚴出版社，1976
9. 格瑞柏斯坦（Sheldon Norman Grebstein）著，李宗 譯：《現代文學批評面面觀》，台北市，正中，1996。
10. 翁英欽：《實踐與開創：新生代觀點—災後重建實務研討會論文集》〈災後社區經濟組織的萌芽：以南投縣清峰合作社的成立過程為例〉，頁：165-186；南投：台灣社區重建協會，2001。
11. 翁秀琪等：《新聞與社會真實建構——大眾媒體、官方消息來源與社會運動的三角關係》。台北：三民，1997。
12. 黃肇新：《實踐與開創：新生代觀點—災後重建實務研討會論文集》〈從家支中心到社福聯盟：九二一重建中的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頁：85-95；南投：台灣社區重建協會，2001。
13. 彭家發：《非虛構寫作疏釋》。台北：商務，1988。
14. 楊素芬：《文本類型對閱讀的影響：以新聞體及小說體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15. 臧國仁：〈新聞報導與真實建構：新聞框架理論的觀點〉，「中華傳播學會 1998 年會」宣讀論文。台北深坑，世新會館，1998。
16. 蔡琰：《電視劇類型與公式結構》。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1994。
17. 蔡琰／臧國仁：〈新聞敘事結構：對新聞故事的理論分析〉，「中華傳播學會 1998 年會」宣讀論文。台北深坑，世新會館，1998。
18. 鄭樹森：《現象學與文學批評》，台北市，東大，2004。
19. 戴衛·赫爾曼主編，馬海良譯：《新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0. 羅蘭巴特（R. Barthes）著，許薔薔、許綺玲譯：《神話學》（Mythologies），台北市，桂冠，1997。
21. 羅伯特·休斯著，劉豫譯：《文學結構主義》，台北市，桂冠，1994。